

“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中共中央
北京香山革命历史
——丛书——

新中国的奠基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
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组织编写

庞松 著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人民出版社

非外借

中共中央北京香山革命历史丛书

新中国的奠基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
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组织编写

杨胜群 张树军 主编

庞松 著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中国的奠基 /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 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组织编写; 庞松著. — 北京: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9. 9

(中共中央北京香山革命历史丛书)

ISBN 978-7-5300-0463-0

I. ①新… II. ①中… ②北… ③庞… III. ①新民主主义革命—史料—中国 IV. ①K26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190126 号

中共中央北京香山革命历史丛书

新中国的奠基

XINZHONGGUO DE DIANJI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 组织编写
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庞松著

*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 100120

网 址: www.bph.com.cn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总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建宏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787毫米×1092毫米 16开本 25.25印张 386千字

2019年9月第1版 2019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00-0463-0

定价: 7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由本社负责调换

质量监督电话: 010-58572393

“中共中央北京香山革命历史丛书”

编委会

主 编 杨胜群 张树军
执行主编 李 良 陈志楣
执行副主编 张恒彬 范登生 刘 岳 运子微
成 员 熊华源 霍海丹 黄如军 庞 松 李 颖
 王均伟 杨明伟 王绍忠 李东朗 郭志刚

编委会办公室

主 任 陈志楣（兼）
副 主 任 陈丽红 苏 峰 张惠舰
成 员 常 颖 冯雪利 乔 克 贾变变 董 斌
 丁 洁 刘 超

序 言

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市地方志办主任

李 良

北京是一座有着3000多年建城史、800多年建都史的世界历史文化名城，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这里历史文化源远流长、积淀深厚，红色文化丰富多彩、独具特色。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视察北京，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明确了北京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的城市战略定位。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革命精神，既是北京肩负的崇高使命，也是建设全国文化中心的题中应有之义。

回望“五四”运动以来的历史，我国发生了三大历史性事件：建立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推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这也是近代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三大里程碑。我们引以为自豪的是，中国共产党孕育在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在北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在北京，北京和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紧紧联系在一起。其中，北京香山是新中国建立前夕党中央所在地。2019年9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北京香山革命纪念地时指出：“中共中央在北京香山虽然只有半年时间，但这里是我们党领导解放战争走向全国胜利、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总指挥部，是中国革命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的重要标志，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

位。”香山承载着党的历史上许多永不磨灭的红色记忆。从政治上看，毛泽东在这里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共中央在这里与各界人士一道组织筹备新政治协商会议，明确了新中国一系列基本国策和宏伟蓝图；从军事上看，中共中央在这里指挥了举世闻名的渡江战役，吹响了解放全中国的伟大进军号角；从经济上看，中共中央在这里积极探索新民主主义国家的经济构成和经济政策，确定了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这里留下了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与众多爱国民主人士共商建国大计的足迹。

深入挖掘好、研究好这段时期的革命历史内涵，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为此，我们启动编写“中共中央北京香山革命历史丛书”，并报请北京市委批准。该项目被列入“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我们感到，组织编写好这套丛书，意义深远，责任重大。我们坚持把市委交办的这项任务作为第一位任务抓紧抓实，秉持“谋划精品项目，打造精品力作”这一主旨，及时成立编委会，明确工作机制，选配精兵强将，精心组织实施，并邀请党史、军史、文献、档案等方面专家反复论证，策划起草丛书编撰方案。丛书紧扣中共中央在香山指挥解放全中国、筹备新政协、筹建新中国等历史进程中的重大事件、重要决策、重要人物，确定编写正史性著作《新中国的奠基》1部，史话体著作《北平和平解放》《进京赶考》《将革命进行到底》《建国方略》《协商建国》《开国大典》《老一辈革命家在香山》7部。编写过程中，我们按照编写原则和规范，坚持推进速度与提升质量相结合、集体攻关与专家主笔相结合、集体“会诊”与主编统稿相结合，形成上下同心、内外一体、环环相扣的工作运行机制。经过一年多艰苦努力，顺利完成编写任务。丛书以全景再现的形式全面生动描绘了中共中央在北京香山时期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画卷，深刻诠释了其中所蕴含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

总体来看，丛书具有以下几个显著特点：



一是主题的鲜明性。丛书紧紧围绕中共中央在香山为新中国奠基这一主题，重点突出党中央在香山时期的这段历史，时间上适当前伸后延；选材上重点突出重大决策、重要事件、重要人物，不惜浓墨重彩；内容上重点突出党中央的战略部署、方针政策、理论创造等各方面的卓越探索和历史贡献。整套丛书既有宏观历史画卷的全景式呈现，又有微观历史细节的画龙点睛式描绘，分别从不同维度、不同角度，解读历史事件，刻画历史人物，挖掘历史内涵，进一步丰富完善了中国革命历史的红色谱系，为中国革命历史园地树起了一座巍峨的精神丰碑。

二是史料的翔实性。为确保史料客观准确、具体翔实，我们会同有关单位赴中央档案馆查阅复制档案资料200余件，搜集相关文献文集、年谱传记、回忆录、专题著作等100余册，分类梳理党中央在香山期间的重大决策、重要事件和重要活动，整理形成《中共中央在香山主要活动》《中共中央在香山历史资料长编》等100余万字参考资料。丛书编写过程中，作者充分运用第一手档案和资料，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确保言之有据、言之有物，确保论从史出、史论结合，切实把客观准确作为丛书的第一生命。

三是编撰的权威性。历史性著作必须反映历史的真实。指导思想，我们坚持以党的两个历史问题决议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历史和党史工作重要论述为准绳，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指导，写历史之实，写历史之是。编撰队伍上，邀请原中央文献研究室常务副主任杨胜群、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原院务委员张树军担任主编，邀请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党校、中央档案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等单位的专家学者为编委和作者。资料运用上，坚持以党史、文献权威著作作为依据，同时注重挖掘新史料，吸收新成果，反复甄别核实，确保丛书的权威性和科学性。

四是内容的可读性。历史通俗读物是我们编写这套丛书的基本定位，可读可学是我们编写这套丛书的不变初衷。基于这一理念，我们在语言上力求做到通俗易懂、平实质朴、简洁明快；叙事上力求做到条理清晰、娓娓道来、泾渭分明；写人上力求做到深入内心、体现精神、生动鲜活；布局上力求做到统分结合、环环相扣、融为一体。我们衷心希望这套丛书能为广大读者奉上一道精神大餐，能够产生动人心扉、催人奋进的精神力量。

革命历史不能沉睡，红色基因不能残缺。这套丛书虽然呈现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过程的一个历史片段，但它却生动展现了中共中央在香山期间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完成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使命、开启中国历史发展新纪元的光辉历程。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精神武装永远在路上。中共中央北京香山革命历史及其承载的革命精神，始终闪耀着自强不息、团结奋斗的时代光辉，始终是我们党必须永远铭记、传承和弘扬的宝贵精神财富。

读史使人明智，鉴古方能知今。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我们缅怀这段历史，就是要继承和发扬老一辈革命家‘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革命到底精神，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勇于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坚决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艰难险阻，使‘中国号’这艘巨轮继续破浪前进、扬帆远航。”“我们缅怀这段历史，就是要继承和发扬老一辈革命家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革命情怀，始终赢得人民的衷心拥护，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紧密团结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共同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我们缅怀这段历史，就是要继承和发扬老一辈革命家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始终保持奋发有为的进取精神，永葆党的先进性和



纯洁性，以‘赶考’的清醒和坚定答好新时代的答卷。”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意味着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意味着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让我们走进这段辉煌的历史，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让我们走进新的时代，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担当作为，为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019年9月

前 言 中国共产党为创建新中国的探索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20世纪世界上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在亚洲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战火绵延、政局动荡的中国大陆，这一件事，超出了那个年代人们的一切想象。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掌握着全国政权和经济命脉，控制着几乎全部大中城市和铁路交通线，拥有数百万人的军队，又得到世界头号强国美国大力援助的中国国民党，败在了长期处于偏远农村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手下。抗战胜利后仅短短4年时间，中国国民党及其政府便分崩离析，一败涂地，“忽喇喇似大厦倾”，惶惶然逃至大海茫茫的台湾孤岛。这一历史变迁，实际上经历了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旧式民主主义革命到五四运动以后中国无产阶级（通过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历史长过程。

1840年鸦片战争发生以后，中国遭受各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陷入灾难深重的境地。近代中国经济严重依附于国际资本主义及其控制的世界市场，不仅近代工业在机器、设备、技术和重要原材料方面依赖外国，西方国家还通过贸易贷款、政治借款，掌握中国铁路、电信等重要部门及政府关税、盐税、厘金等财产收入，使中国在财政金融方面有很大依附性。在中国领土上，列强以武力为后盾，通过不平等条约获得租界或租借地，实行殖民主义制度。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瓦解了中国封建社会自然经济的基础，使中国不可能继续保持完整的封建经济形态，在客观上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某种条件。在近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代表着比较进步的生产关系，对于促进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具有积极作用。但是，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下，中国民族资本苦于在夹缝中求生存，发展很不充分，力量非常薄弱。因此，资本主义不可能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这些情况，反映了

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特征。

从19世纪七八十年代起，中国的一切有识之士、爱国团体和近代意义上的政党，都力求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和被动挨打的处境。多少仁人志士舍生取义，奔走呼号，力主“变法维新”“富国强兵”；举凡倡洋务、办实业、兴新学等种种救国方案，均逐一试验，试图按照西方国家模式使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然而，这些努力均以失败告终。这主要是由于近代中国所处的历史时代，正逢世界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老牌的和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为争夺世界市场，建立和扩大其势力范围，唯有不遗余力地掠夺和榨取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资源，自然不会让拥有广阔市场和丰富资源的中国成为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近代中国之所以不能从封建制度发展到资本主义制度，基本原因就在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帝国主义势力和封建买办势力的联合统治，既是近代中国贫穷、落后和衰弱的根源，又是中国民族灾难和人民灾难的根源。

外国帝国主义瓜分豆剖、虎视鹰瞵，亡国灭种的厄运无情地撞击着中国先进分子的心灵。救亡图存、重建国家，成为压倒一切的主题。在近代资产阶级民主思潮的影响和推动下，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以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相号召，历经多年奋斗，终于在1911年领导发动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民国，在风雨如磐的中国树起民主共和国旗帜。“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封建专制制度在中国从此不得人心。在漫漫长夜里苦苦挣扎的中国人民，开始有了新的觉醒。

废除封建专制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国，是近代以来改造中国、探求国家出路的种种进步力量所努力追求的最高境界。中国社会的现实条件最初赋予资产阶级这个历史责任。孙中山领导资产阶级革命推翻帝制后，立即把建立民国的理想付诸实践。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宣告成立。3月1日，第一部资产阶级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颁布。南京临时政府就其性质来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政府。但是，在新旧势力的尖锐斗争中，帝制复辟派袁世凯打败了资产阶级革命派，窃夺了民国，南京临时政府仅存在91天。孙中山为民主共和奋斗的锐气不减，他先后领导护国、护法运动，两度在广州建立政权，但坚持的时



间均极短，且政令所及不过二三省，很快遭到失败。至此，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尝试终至完结。资产阶级革命建国实践屡遭失败，昭示着在中国创建新国家只能另辟道路。孙中山贵在顺应时势，将他的旧三民主义发展为反帝反封建的新三民主义，丰富了国家重建理论，它留给中国先进人士的启示和思想财富是宝贵的。

1921年，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件。中国共产党在创立时只有几十个人，却是近代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它从成立的第一天起，就把“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的任务写在自己的纲领和旗帜上。孙中山致力实现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终于在中国找到其实际承担者。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在继承孙中山的宝贵遗产，并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孙中山建国理论中进步和合理的因素，日益走向别开生面的创新，形成一整套富有独创性的新民主主义建国理论。

1924年，中国共产党同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实行第一次国共合作，迅速掀起反帝反封建的第一次大革命高潮，极大地开拓了工农运动发展的新局面。1927年4月，国民党右翼蒋介石集团叛变革命，分裂国共合作，共产党奋起武装反抗，被迫离开城市到农村开辟革命根据地。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就独立担负起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历史重任。而共产党创建新国家的实践，正是从在农村革命根据地建立工农民主政权开始的。

在近代中国，首推共产党致力建立真正的民主社会，率先在它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和人民军队中实行一种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民主制度，树立起崭新的民主意识和民主风气，并逐步摸索和总结出一套民主政权建设的基本经验。这种实行新民主主义制度的政权模式，最初分散在中南、中西部几省交界的小块红色区域内。它们与全国其他地方的国民党政权相对立而存在，并在艰难曲折的斗争中渐次发展壮大。

根据1928年中共六大决议中关于“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权”的政纲，各红色区域普遍建立起工农兵代表会议制的苏维埃政权。这种从苏联借用来的政权组织形式，统称为工农民主政权。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举行，会议通过《中华苏维埃共和

国宪法大纲》、劳动法、土地法和经济政策等，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这虽然远非完全意义上的全国政权，但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大众旨在建立新国家的最初尝试。

由于缺乏经验，尤其是处于反革命白色政权的包围和激烈的军事战争环境，没有相对稳定的社会政治条件，工农民主政权本身还存在许多缺憾，如政权组织形式、机构设置及职权划分等，基本上照搬苏联苏维埃制度的做法。由于地区分割的影响，各地在基层选举的程序、选举权范围、代表会议作用的发挥、政府工作程序和内容，以及中央对地方政府的指导等方面，存在许多不足和不完善的地方。特别是当时“左”倾路线在党内占主导地位，排斥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致使政权构成的政治基础过于单一，在土地、劳动、经济等政策及对待中间派别方面，有许多脱离中国实际的“左”的规定，给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带来不利影响。尽管如此，从总体上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初步实践，为后来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提供了初步经验和借鉴。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不顾民族大义，仍孤注一掷执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全力“围剿”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日本帝国主义乘隙入关进逼华北。在空前的民族危机面前，1935年1月，中国共产党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纠正了“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急遽变化的国际国内形势，为中国共产党调整完善建国理论提供了历史契机。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名义，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呼吁国内各党派、各界同胞、各军队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同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瓦窑堡会议，确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这次会议的决议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改变为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把工农民主共和国政策的许多部分，“改变到更加适合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殖民地的情况”，以更充分地表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不但是代表工人农民的，而且是代表中华民族的。

毛泽东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我们的政府不但是代表工农的，而且是代表民族的。”“人民共和国应当首先代表工人和农民的利益。但是人民共和国去掉帝国主义的压迫，使中国自由独立，去



掉地主的压迫，使中国离开封建制度，这些事情就不但使工农得了利益，也使其他人民得了利益。总括工农及其他人民的全部利益，就构成了中华民族的利益。”^①这个论述，对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历史局限性做了历史总结，将中国共产党的建国理论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考虑到国内时局的特点，也为了争取蒋介石合作抗日，1936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致国民党书，进一步将“人民共和国”改变为容易被各方面所接受的“民主共和国”，提出愿与国民党共同建立全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主张。这体现了抗日救亡时期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同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中共派代表团赴西安调停，促使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等6项条件。为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早日建立，中共中央于1937年2月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5项要求，如国民党将此定为国策，中共愿做四项保证：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的方针；工农民主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特区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以七七事变为标志，中国进入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8月，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提出全面抗战的主张，将所属武装力量先后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和新编第四军，开赴抗日前线。9月下旬，根据国共谈判达成的协议，中共正式宣布取消中华苏维埃民主共和国国号，将中华苏维埃民主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驻西北办事处，更名改制为中华民国陕甘宁边区政府。这是中国共产党由工农民主政权走向建立抗日民主政权迈出的关键一步。从这以后，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游击队在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相继在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山东、华中、华南等地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建立地方性抗日民主政府。

随着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原来国共分裂时期形成的阶级关系、政治格局以及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的相互关系，都在彼此调整之中。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性质，由共产党独立领导的红色行政区域，改变为国民党执政的中华民国所属的一个行政区域；由只接受共产党领导的独立的地方政权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6、159页。

实体，转变为在接受共产党领导的同时，也隶属于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统辖的一个地方政府。从政权性质来看，由过去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联合的工农民主专政，转变为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各革命阶级和一切爱国人士对汉奸、卖国贼的民主专政。由此构成政权的社會基础变得十分广泛，不仅有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参加，而且有民族资产阶级、富农、一般地主参加；不仅有共产党员参加，还有国民党员、其他民主党派成员参加。专政的对象缩小到汉奸和卖国贼，即使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只要不是汉奸、卖国贼，亦非专政的对象。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原来工农兵代表会议制的政权组织形式，已不适应建立不同阶级和不同政治派别的抗日民主政权的要求。根据中华民国国民参政会关于在各省、市召开参政会的决定，陕甘宁边区议会改为边区参议会，并以参议会为最高权力机关，参议员由人民直接选举。中共在边区政府仍然起着领导作用，重要政策和措施基本由中共决定，通过边区政府颁布实施。为适应集中力量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生存的中心任务，边区政府的各项政策，无论是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都相应地进行调整，停止了暴动政策和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农民的政策，转向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抗日民族战争服务的政策。边区政府对国民政府采取统一战线下的独立自主原则，既坚持抗日民族斗争的统一性，又保持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

陕甘宁边区建立的参议会制度，作为抗日民主政府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向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推广，各抗日根据地相继建立起参议会制度。抗日民主政权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参加各级参议会和政府的，以阶级、阶层论，有工人、雇农、贫农、中农、其他小资产阶级、富农、地主、资本家、开明绅士；以党派论，有共产党员、国民党员、其他民主党派成员；以民族论，抗日民主根据地实行各民族权利一律平等。为了确保抗日民主政权阶级构成的广泛性，中国共产党提出著名的“三三制”原则，规定抗日民主政权中的人员分配，共产党员、非共产党的左派进步人士、中间人士或其他方面人士，各占1/3。其中，共产党员代表无产阶级和贫雇农的利益，保证共产党在政权中的领导权，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党的建议。非党左派进



步分子代表他们所联系的广大小资产阶级群众，以利于争取这部分群众坚持抗日。中间派占1/3，目的在于争取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这是孤立顽固派的一个重要步骤。

中共中央强调“三三制”原则，是共产党“真实的政策，不能敷衍塞责”。在政权建设上严格执行“三三制”，既保证共产党对抗日民主政权的领导，保证政权中工农和其他劳动人民占优势，又体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广泛性，最大限度地争取中等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中的开明绅士，从而团结一切抗日阶级和阶层，孤立顽固势力，巩固抗日民主政权。同时，也扩大抗日根据地民主政治的影响，打击国民党、蒋介石的一党专制和个人独裁，对推动全国政治民主化起到积极示范作用。

国共合作的全民族抗战，使中国共产党在争得合法地位的环境下，将以往局部区域内的建国实践扩展到空前的规模，从而为党的建国理论逐步趋于成熟创造了必要条件。1940年1月，毛泽东在他的重要著作《新民主主义论》中，较系统地阐述了新民主主义建国的若干基本思想，概括有以下几点：

一、中国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乃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基本势力。这些阶级，或者已经觉悟，或者正在觉悟起来，他们必然要成为中华民主共和国的国家构成和政权构成的基本部分，而无产阶级则是领导的力量。现在所要建立的中华民主共和国，只能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

二、这种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一方面和旧形式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共和国相区别，那是旧民主主义的共和国，那种共和国已经过时了；另一方面，也和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的共和国相区别，那种社会主义的共和国已经在苏联兴盛起来……但是那种共和国，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中，还不适用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因此，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在一定历史时期中所采取的国家形式，只能是第三种形式，这就是所谓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是在

一定历史时期的形式，因而是过渡的形式，但是不可移易的必要的形式。

三、国体（即指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即指政权构成的形式）——民主集中制。^①

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以中流砥柱之气概，坚定地站在民族解放斗争最前列，始终坚持团结全民族实行人民战争的全面抗战路线，反对国民党压迫人民的片面抗战路线。无论出现怎样的艰难困苦和复杂局面，始终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名副其实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重心，中国人民解放的重心，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重心。

为了有效地团结各社会阶级共同抗战，以陕甘宁边区为中心的各个抗日根据地，坚持不懈地进行民主建政，保障抗日各阶级的人权、财产权及参政权；在政府机关厉行廉洁政治，实行精兵简政，减轻人民的负担；开展拥军优属运动，密切军民关系和军政关系。在经济建设方面，大力号召发展农业，动员农民开垦荒地，兴修水利，组织劳动互助，提高耕作技术，特别把减租减息、合理调整租佃债务关系作为解决农民问题的基本政策，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农村生产力的发展；鼓励发展私人企业，保护私有财产，实行自由贸易的工商政策；同时发展人民的合作事业，扶助手工业发展。这些经济政策有力推进了解放区的工业生产和区内外商品流通。解放区军民还开展“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大生产运动，以保证在基本物资供应条件下度过抗日战争最艰难的岁月。

以“全民抗战，建设国家”相号召，中国共产党倡导和弘扬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给国民党的文化专制以极大的冲击与削弱。抗日根据地注重开展文化教育建设，发展进步文化事业，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为抗日军队和根据地建设培养了大批骨干。由解放区延及国民党控制的大后方，各种报刊、团体、演出队非常活跃，以文艺、戏剧、讲演等多种形式，宣传抗日，动员民众，以先进文化来教育、鼓舞人民；中共在国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6—677页。